

处理好“稳”“进”关系落地为实

秦丹

今日论语

开头好，赛金宝。前两天，十届上海市委十四次全会召开，回顾总结了2016年走过的路，同时规划2017年的工作，要求来年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进中提质，在稳的前提下求关键领域有进取、突破，定下了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稳”，是发展的前提。过去一年绝非一路平顺，国内外发展环境有目共睹，但上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求进，好于预期。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海在社会治理、精神文明建设、党建和反腐等方面也体现出“稳”的特点。这是上海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用体制机

制管人做事的结果，同时体现出一种大局意识和领导智慧。做好来年的工作，正如韩正书记强调的，上海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全面加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确，党员干部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党的全局事业概念，没有对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的分析把握，就不能正确认识上海当前发展“稳”和“进”的关系。

“进”，是“硬”道理。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其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发展模式的探索，也往往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就明年上海的发展，市委提出了十方面的重点工作，进一步改革开放，攻坚深化改革，推进创新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

先后推进了15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任务，有一部分是中央要求上海先行先试的，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中央部署，在一些领域进行贯彻落实的。上海有责任来年继续当好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人民长期努力，希望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海的稳步发展是民心所向，因此“稳中求进”至为重要。

“稳”，是不冒进，但“进”是历史的选择，关键是要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许多矛盾，都是在发展中解决的。如果只求“稳”，没有“进”，矛盾恐怕会越积越多，难有真正的“稳”。但若过于“激进”，虚火过旺，必然会“损神伤精”。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上，也是如此。要分清当前发展阶段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而

不是只着眼于讨论哪个形式更好的问题，要在全局的、历史的认识视界中，考虑二者的关系，才能让上海经济走在康庄大道上。

不论是求“稳”，还是求“进”，得靠基层工作一步一步地去落实。各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四个意识”要“走心”，这样才能真正站在全局的、历史的角度，踏踏实实地去落实一项项工作，才能为2017年刷出闪亮的发展数据表。在经济转型升级期，领导干部不能仅仅把自己当“领导”，还要当“专家”，自己不是专家就要去亲近专家，但要学会辨别真专家伪专家。要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当大事，兢兢业业，既勤又廉，在富于人文情怀和专业精神的工作落实中，体现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新民随笔 校长的担忧

邵宁

在如今的中国，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孩子个个都是家里的宝，只有受到父母和祖辈呵护的份儿，谁想得到竟然还有被暴打的！前几天碰到一位小学校长，听她讲了个真实故事，令人心情沉重。

“几年前，我们学校有个小女孩，她是单亲家庭的，跟当厨师的爸爸一起生活。她经常被爸爸打，小脸上青一块肿一块，身上也都有一条条伤痕，大热天都穿着长袖，我们老师曾经拍下照片作为证据。后来，她变得很敏感、胆小，个子也比同龄孩子矮小。

“我们和孩子的妈妈联系过。她的妈妈是外来妹，离婚后有一次来看女儿，也被她爸爸打，吓得再也不敢来了。而且孩子的父亲和所有的亲戚都断绝了来往。有一次他打得厉害，女孩离家出走了，走了十几公里，一直走到南京路，后来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派出所，我去派出所接她。和警察一起把女孩送回家。我警告父亲，再打孩子，就报警，剥夺他的监护权。他竟然振振有词地说，我打孩子是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他显然是心理上有问题。

“像这样的父亲，很显然是不适合监护孩子的。如果在美国，如果孩子遭受家庭暴力，很快就会有司法机关介入，把孩子送到合适的机构或家庭，由其他人监护。可在上海，却没有这样的制度。警察说，即便把父亲抓起来，孩子又能到哪里去？”

“后来，这个父亲把房子卖了，带孩子搬到浦东去了。我很担心她，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被父亲打。我们对于这样的父亲，就没有办法了吗？”

顿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瘦小的、眼睛里闪着泪光的女孩。长期遭到父亲暴打，在她心理上造成的伤害要比身体上的更大，可能她长大后都很难走出这种阴影。在全国范围内，虐童事件也时有发生。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虐童罪，只有刚刚施行的反家暴法。而家暴这种行为通常属于自诉范围，即需要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起诉。一个未成年人怎么去起诉自己的父亲？而且如果施暴者又是孩子的唯一监护人，孩子该怎么办？

孩子都是幼小的花朵。我们有派出所，有居委会，有青保办，有少年庭，可对于这样受到伤害的花朵，究竟哪个部门能够保护他们呢？

新民新语 再说说阅读

易蓉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袁征最近和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些实验，想看看屏幕阅读和纸质阅读的效果到底有没有差异。实验在99个小学生和176个中学生中开展，学生们被分为两组，分别在电脑显示屏上和纸张上阅读一样的新闻素材，然后完成一些理解题来测试阅读效果。结果无论在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中，纸质阅读理解和回忆的准确性都明显比屏幕阅读组要高。袁征团队还有意在小学生阅读材料里安插了一些别字，结果纸质阅读组49个孩子有34个发现了别字，而屏幕阅读组50个孩子只有17个发现别字。这场实验也在大学生中开展，其中一个班的结果和小学、中学组差不多，而另一个班的学生只花了几分钟就匆匆“交卷”，测试时间只有其他班的三分之一，袁征直接作废了这个班的实验。

通过这个实验，大家发现在屏幕上阅读更容易忽略一些细节，因此袁征觉得，“乔布斯和盖茨很棒，但还挤不走蔡伦。要快捷，看屏幕。想理解得深，还是得看书。”

也有研究人员利用眼动仪对电子书和纸质书的效果进行研究。发现电子书在正文和图片上的观察时间和注视次数都少于传统纸质课本，而正文的注视次数与内容测验的成绩呈正相关。不过，另一方面，电子书集纳的音频、动画等多媒体内容对学习主动性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阅读效果究竟是受什么影响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认知心理学、语义学、神经科学等等。比如“汉字顺序并不一定影响阅读”这句被颠倒的话在朋友圈传了好几年，每次出现还是有人“中招”。其实这是因为人们阅读时视觉的捕捉是以区间为单位，相邻的调换影响不大；同时，人脑识字的过程包括视觉捕捉、意义加工和记忆等，人脑会根据已有的知识库进行关联并赋予意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看不出错别字。

技术革命创造的时代不可能要求社会倒退，但追求技术带来更多效益的时候，应该做更多研究来引导未来。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本身并不矛盾，我们的症结在于，如何创造令它们各显其能的环境。

向“逆向激励”说不

权威声音

在经济学领域，政策设计初衷与实际执行效果呈现“事与愿违”的现象，被形象地概括为“逆向激励”。

对于人员管理使用而言，也存在逆向激励的陷阱。要想科学运用激励方式，必须做到部署周密、赏罚分明、机制健全，有效规制具体政策的“逆向空间”。

有群众反映，尽管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办事

却不灵了。究其原因，有的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错误认为“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没错”，于是宁可庸政懒政，也不愿担当担责。

干部不想干事，固然有自身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然而也应看到，个别地方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方面尚存偏差，在制定干部激励措施等方面并不周全。譬如，有的地方把“不以GDP论英雄”异化为“不要GDP”，念歪了经；有的部门出台文件缺乏调研、朝令夕改，结果“政策总在奔跑”；有的

单位在惩处上层层加码、在奖励上一概回避，消解了积极性。

从这个意义出发，解决干部不想干事的问题，关键在于周密施策，既让不干事、不想干事、干不成事的人失去市场，也要为想干事、能干事、善成事的干部搭建舞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干部愿作为、多作为、善作为，不断强化正向激励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方能最大限度挤压逆向激励潜存的基础与条件。（李浩燃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伪善

网络公益新事物，面对伪善要说。捐赠之后又收回，反复炒作真可恶。网络直播平台「快手」的一些主播为涨「粉丝」，前不久在四川凉山州贫困山区某农村做假慈善，直播时发钱结束后就收回。业内人士呼吁，要严格执法网络直播实名制登记和「黑名单」制度，管住网络直播中的违法违规行径。 曹一画

网视舆情

批评有风险，发言须谨慎，这句话在互联网上正逐渐得到验证。以往人们的发言面临法律风险，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风险被放大。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批评尺度的理解存在差异，也可能导致司法纠纷，被围观者视为正常的批评，在利益相关者那儿则可能理解为抹黑。最近，电影《长城》片方就不忍批评，该片公映第一天，影评人“褒读电影”公开炮轰张艺谋，抨击《长城》是一部烂片。片方随后发布警告函，要求该影评人删除微博、置顶道歉，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过去互联网上发言的法律风险，主要因为发言门槛太低，人们发言过于随意，有时不分青红皂白，尤其在一些公共安全话题上，在未证

《长城》的杂音

何小手

实的情况下爆料，可能造成坏的社会影响，于是面临司法纠纷。全国很多地方已出现网民因“造谣”而受到司法指控的现象，其中的核心在于，发言者是否违法，主要依据在于其所指向的事实是否存在，显然这很好判断。而如今针对“批评”的指控，则具有不确定性，甚至是见仁见智，所以很多案例往往都无终而返。

“褒读电影”在文章中的批评，主要是从导演的叙事、演员的表演去评价，这在最近针对这部电影的评论中都很常见。和过去的类似案例一样，在引发此次法律纠纷之前，舆论对于该片的评价的确呈现出两极分化，粉丝只看偶像而忽视

电影自身的品质，可能不够客观，而按照行业潜规则，一部电影上映总会有不少公关性质的评价出现，也就是所谓的“水军”。网上有一定影响的博主一旦发出批评，跟帖就会有很多反驳，其阵营之强大，准备之充分，让人猝不及防，很难想象这就是互联网舆论的真实生态。与之相对，在那些相对专业的社交平台，影迷对该片的评价并不高，到底哪些是领工资的杂音，哪些是正常的反馈，目前看来似乎难以甄别。

抛开上述争论，按理说，判断一个评价行为的性质应该考虑发言者的动机和依据，那么，水军的吹捧，难道不会干扰公众判断？那些有组

织的赞美，是否也要面临法律制裁？目前的状况是，对于批评不容忍，对于充满水军嫌疑的赞美则视为正常，水军横行，至今都没遭遇过法律纠纷，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张艺谋导演曾提到，影迷对院线大片的批评存在“双重标准”，意思是影迷越来越挑剔，这种批评心理可能的确存在，对国外的烂片可能不以为然，但一旦国内导演尤其是知名导演拍出烂片，就可能加码吐槽。但这不足以回应外界的批评。其实，一部片的好坏并非没有评价标准，尤其在行业内应该会有一些的共识，片方不能容忍批评，只是担忧影响票房。互联网时代，电影营销对舆论反馈极为敏感，批评和赞美，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法律该作何判断尚不好说，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要看到真实的评价，将越来越难。